

治理产能过剩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刘彦洋

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适度的产能过剩可由市场自行调节,也有利于应对未来市场需求变动,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但当产能严重超过有效需求时,就会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经济效率。产能过剩调控是长期系统的工程,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建立科学的产能利用率统计路径方法,完善竞争和创新环境,推动配套改革。

针对产能过剩的调控历程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长期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告别短缺经济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之后,虽然从未出现过全面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但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几乎从未间断过。十余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就通过一定的方式发布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预警,先后在1999-2000年、2003-2004年、2006年前后和2009-2010年对产能过剩四次进行集中调控和治理。2011年“十二五”规划开始,中央针对产能过剩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从政府历次调控产能过剩的政策文件看,主要治理措施包括以下几类:(1)发布信息和提示风险。相关文件经常对不同行业供求关系现状和趋势提出评估预测意见并强调风险;(2)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审批;(3)提出环保、安全、技术等标准;(4)限制产能和淘汰产能;(5)促进兼并重组;(6)抑制投资等。由政府主导和直接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全面调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行政手段如土地、建设、环保、安全和信贷政策等。

政府在产能过剩调控方面可谓“用心良苦”。这些举措具有一定成效,但与预期目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相关调控措施过多强调惩罚限制,而较少采用正面激励。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企业效率低下和竞争力不强,十余年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甚至陷入了越调控越严重的困境,难以解决深层次问题。根据对1256家上市公司所做的调研,1/4的调查上市公司认为所在行业存在产能过剩,其中制造业居多。42%的上市公司认为是政府原因导致所在行业产能过剩,包括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失当;规划、约束能力较弱;政府追求GDP,驱动企业加大投资,扩大产能等。

现行产能过剩调控的主要问题

一是发布信息是调控产能的重要措施,但是政策制定者所掌握的市场信息也可能存在不全面和滞后。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产能过剩判断指标体系,政府主要是通过对部分商品的供求和行业产能利用的调查,并根据相关经验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市场需求作出预测,来判断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由于数据的支撑极其有限,加上预测方法不一定恰当,政府对产能过剩的判断未必就是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准确预测,以政府强制力控制产能增长的结果可能助长市场的畸形。

二是建立技术、环保、规模、能耗等外部性标准有利于限制和淘汰落后产能,但关键是标准的内容适当以及执行落实到位。如工信部2009年底完成并公布的《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提出的标准,2008年度产能在百万吨以下的普通钢企和150万吨以下的特钢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而全国能达到准入条件的约只有1/5的钢企。这一标准的科学性当时遭到了质疑,其颁布实施也遭遇多方阻力。某些产能过剩的新兴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方向不明朗、技术标准也未确定,很难依靠行政主管部门人为划定合理的限制标准。

三是政府的调控措施往往从严格审批入手,但严格审批某种程度上是在释放信号,告诉企业这个行业在下一个阶段会有发展的前景,有时还会限制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入。政府的干预政策反而可能强化“寻租”空间,企业会动用资源获取特殊通道及保护自己。以水泥行业为例,2009年国务院就明确要求严控新增水泥产能,禁令反而引发了扩张热潮。而兼并重组,很多时候并不是由企业自发进行的,更多的是“拉郎配”。地方政府往往依据企业规模来决定保留和被兼并的企业,反而会进一步刺激企业竞相扩大规模,强化产能过剩。

四是产能过剩在地方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我国的产能过剩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机制,地方和地方不一样,企业和企业不一样,很难基于行业数字的产业政策就能达到调控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产能过剩既有传统行业,也涵盖某些新兴产业。不同产业特点和需求也存在差异。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部分是缘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剩是由于过多政策优惠的刺激“一哄而上”。

五是相关举措的执行落实不到位。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淘汰过剩产能,而地方政府为稳增长、保就业,

甚至“政绩工程”等,在抑制产能扩张方面缺乏积极性,许多地方借淘汰落后产能搞规模扩张。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主体,招商项目设计、招商谈判和优惠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GDP、就业、金融稳定等,利用低价供应用地、税收返还、违规贷款、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尽可能上项目、扩产能,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建立科学统计方法

产能过剩调控是长期系统的工程,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建立科学的产能利用率统计路径方法,完善竞争和创新环境,推动配套改革。

一是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市场化退出机制。产能过剩是市场问题,解决的最有效途径应当是市场化道路。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优胜劣汰,落后产能本应在成本、价格和利润杠杆的作用下自然退出市场,实现供求均衡。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价格调整、需求变动、资本退出等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产能扩张中,当事人是企业、投资者。企业投资扩张的冲动,应通过市场去调节。只要企业认为其产能扩张有市场竞争力、有效益,那就不应限制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也不能因某个行业一段时间的低速就匆忙出台扶持政策,以非市场力量干预产业,避免因强化审批而导致扩张投资项目、增加新产能。如美国在钢铁业没落时期,政府除采取过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零星的研发投入外,主要由市场力量主导整个产业整合,制造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服务业取代。政府通过鼓励发展新的产业来代替传统行业刺激经济增长,基本依靠市场手段,通过企业竞争淘汰落后产能。

完善企业注销、破产、退市等市场化退出机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性机制。当前我国企业正常注销要经历多部门前置串联审批,程序繁琐周期长,破产重整审批程序多,破产相关规定缺乏实施细则,破产清算耗时较长。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和机制,推动资源有效退出和再循环,通过市场主体对自身产能及经营的调节,实现调整产能过剩的目的。

二是借鉴美日等国经验,实施细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统计和产能过剩预警指数编制,并及时发布,服务企业投资和决策。我国转型经济体制环境具有特殊性,政府行政干预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关键是与市场机制协调一致。政府的角色应当避免用自己预测的未来市场需求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而应该通过发布经济实际运行中的投资规模、信贷总量、市场需求情况等自己具有优势的总量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整个经济现在的投资和供给情况,从而引导资金投向。

目前我国缺乏科学的产能利用率统计是导致重复投资的重要原因,有必要通过权威机构如政府或行业协会等,建立和发布产能利用率指标和产能过剩预警指数。美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产能信息的统计和发布,效果良好。如美联储每月公布一次产能利用率情况,报告上一个月内的内容,并在后继的三个月中稍作修改,接下来在秋季一般是11月作年度修改。政府部门通过提供有关信息提示引导进行干预。

三是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从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状况来看,除了产能,产业集群及市场竞争的有序是另一突出问题。以钢铁业问题为例,我国的钢铁产业由于集中度不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相对薄弱,最典型如我国钢铁产能占到了全世界钢铁产能的一半,但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上缺失话语权。而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无序程度剧烈,无法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很难推进。政府应进一步改革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破地区分割,推动行业重组,支持行业优秀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产能和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向海外转移产能。

四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企业创新和升级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我国目前多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投资时,研发成果易被复制。从生产经营阶段看,创新动力不足导致低水平竞争。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对于研发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完善科研成果产业化机制有利于企业在产能过剩中取得竞争优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享受研发成果创造良好环境,保证高效企业在竞争中胜出。

五是推进配套改革,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推动政策落实。改革财税体制和考核机制,保证地方政府与事件相匹配的财力。如果不改革,地方政府作为经济行为人就会有动力保护落后产能。政府定价的能源资源价格偏低,一些企业以投资生产项目的名义经营能源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利用空间大刺激企业跨行业经营,建议改革现在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定价作用,促进企业经营成本市场化和平。

前沿视点 Outlook

“货币战争”是过时概念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 郑学勤

经济发展失速的政策反应

“货币战争”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货币战争描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它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将货币贬值,得到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优势。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率先放弃金本位将货币贬值的国家,确实是首先恢复经济的国家。不过,今天的世界要比当年复杂得多。

在金本位时代,各国都有明确的汇率政策,知道怎么调整同其他国家的汇率。今天,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中,没有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汇率政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预测到本国汇率行为的实际后果,更不要说量化这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发动货币战争,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发动货币战争。

在经济大萧条时,无论英国脱离金本位制,还是美国调整美元同黄金的汇率,黄金都是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一个国家要将货币升值或者贬值,只要调整本国货币同黄金的汇率。就可以调整它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比率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的货币体系基本是一种准美元体系。各国的货币都直接或间接地同美元的价值产生联系。美联储实行量宽政策,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压低汇率,而是为了压低利率。但利率本身是货币的一种价格。因此,随着量宽政策的扩大,美元相对其他交易货币的价值持续下跌。

与经济大萧条时代不同,在这次危机中,因为变相存在的美元本位制,美元本身既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又代表了准黄金的国际标准。因此在美联储实行量宽政策时,美元价值下跌,等于国际货币价值下跌;反过来说,等于相对推高了大部分其他国家货币的金融市值。

现在,美联储退出量宽政策,准备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指数因此在8个月内上升了19%。因为美元代表了国际货币价值,美元价值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又推高了其他相关货币相对商品的市值。今天我们看到的各国货币相继贬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各国货币在试图修复同国际货币价值之间的比率关系。换句话说,目前所谓“货币战争”,其实只是各国对经济发展失速的一种被动的政策反应。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面临的挑战

忽视汇率同利率之间的能动关系是一种理论缺陷。美国政府职能的分工体现了这种缺陷。在美国,汇率是由财政部管的,利率是由美联储管的。美联储制定利率政策时,不必考虑它对美元汇率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顺畅的情况下,这种分工显示不出它的缺点。但是,在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元同其他货币的关系就成了美联储面临的棘手问题。

美元的国际地位是美国的特权,但也可能成为美国的包袱。美国是贸易逆差国,其出口只占经济

- 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中, 没有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汇率政策,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预测到本国汇率行为的实际后果,更不要说量化这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发动货币战争,也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发动货币战争。
- 美联储目前正在决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间上面临挑战。货币政策正常化并不只是提高利率,还涉及到如何化解在零利率和量宽政策留下的负担。
- 人民币的价值需要有个锚,这个锚不应当是美元,也不应当是一揽子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应当建立在国民资产的价值上。否则,中国经济会不必要地因为汇率的干扰而受到其他国家利率政策的影响。

总量的13%。因此很难说美联储量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美元贬值,但美元贬值又确实是量宽政策的后果。美联储需要货币政策来帮助美国经济,但国际间的美元流动会冲销联储政策的效力。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美元下跌应当是自然反应。但是流入美国寻求安全的美元反而推高了美元价值。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有一个衡量金融恐慌情绪的波动率指数(VIX),有学者做过统计,金融危机以来,只要VIX的上升,就出现美元流回美国的情况。美联储在作出货币政策决定时可以不考虑美元的走势,但美元的走势还是会影响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应。

美联储目前在决定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时间上面临着挑战。货币政策正常化并不只是提高利率,还涉及到如何化解在零利率和量宽政策留下的负担。

由于多年的零利率,廉价美元渗透到各类金融资产的各个角落,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了影子银行管理的资产。美国影子银行规模相当大,它们总资产价值高过美国的GDP总量。影子银行的运作是借助杠杆力的,金融杠杆力需要质押,金融质押的很大一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债券的价值同收益率成反比,债券收益率取决于利率。利率上升,质押物的价值会因此降低,因而产生追加保证金的要求。机构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就会抛售债券。抛售债券会进一步压低债券价值,这就会产生所谓的“杠杆效应”。1997年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就因为这种杠杆效应而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影子银行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视野之内,这就成了美联储面临的一种不确定性。

美联储在实行量宽政策的过程中,积累了4.5万亿美元债务。美联储的计划是不准备抛售这些国

债。联储的逻辑是,几十年之后,随着债券到期和积累的利息收入,这些债务将自然消失,这样做可以避免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但是,这样做也会改变美联储历来管理利率的方法。

美联储历来通过从银行买进国债的方法来调节流动性和长期利率。这是一种通过市场运作间接管理利率的方法。现在,因为美联储已经持有了4.5万亿美元债务,并且准备将这些债券卖掉,因此市场运作的手段就变得非常有限。除了回购之外,美联储将主要通过银行存放在联储资金的短期利率来直接决定基准利率,换句话说,联储将更依赖于联储官员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市场来决定利率,这就创造了另一层不确定性。目前,联储官员对2017年之前利率的预测,同国债期货市场的预测之间就相差一倍。

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这些不确定性,在如何贯彻新的货币政策方面,联储官员之间也有分歧。在2月底的一次论坛上,美联储副主席费歇尔主张,因为市场有疑惑,所以联储在开始执行新政策时应当坚决果断。在同一个论坛上,联储的另一位副主席杜德利则说,因为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开始执行新政策时应当谨慎。对市场来说,这种分歧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性。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货币战争”的理念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汇率是调整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媒介。同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同,今天的“货币战争”表象,反映出的并不是哪个国家想要利用货币贬值的方法来占其他国家的便宜,而是折射出各国为了对付不同经济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利率政策。利率政策而导致的汇率变化,自然会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解释这些汇率变化,它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就更大。

一个国家需要有独立于利率之外的汇率政策,目前的这种“货币战争”状态是国际货币体系失效的一种表现。如果说这种状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启示,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是人民币简单地加入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人民币的价值需要有个锚,这个锚不应当是美元,也不应当是一揽子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应当建立在国民资产的价值上。否则,中国经济会不必要地因为汇率的干扰而受到其他国家利率政策的影响。凯恩斯曾经建议,将国际货币建立在一揽子商品价格的基础上。当时国际货币要解决的主要是贸易问题。今天,货币的各种金融功能不断体现出来。对货币来说,资产的属性变得比商品的属性更重要。在纸币经济里,国民财富的总值不会因为增发货币而增长。维持资产财富与货币财富之间的平衡,成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功能。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发行国家的国民资产总值。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不同货币之间的合理汇率。除了健康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之外,中国需要统一的债券市场和健全的股市来发现和交易自己的资产财富价值。否则,人民币的国际化将难以顺利实现。

社交金融,将金融融入医、食、住、行、玩等不同生活领域,实现财富资产管理、健康管理、生活管理等互联互通的业务布局。

三是渠道布局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企业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在实现互联网、物联网基础上的“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未来“社区化、智能化、小型化”将是银行业物理网点布局和转型的方向,通过一家智能型综合支行+一些小型或小微支行+数量更多的社区支行+规模广泛的自助银行+随时随地使用的手机银行,商业银行将构筑线下小型化与线上智能化互动发展的渠道服务新格局。建立在自助银行功能升级基础上的社区支行是综合支行的延伸,可以有效解决银行服务客户的“最后一公里”距离问题;自助银行服务+零售服务专区是社区银行最基本的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加入VTM(远程智能柜员机)+互联网金融是智能升级版的社区银行,再加入速递服务、便民设施、儿童娱乐等便是全功能的社区金融服务中心,是普惠金融和老年金融的重要组成;具有介质随身、服务及时和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的手机银行则是中青年客户移动生活的门户人口、移动金融服务的主要平台和生活服务的主要渠道。

四是产品服务创新。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低资本消耗、高收益回报、风险总体可控是产品服务创新的方向,而相应的社区金融、小微金融、移动金融和资产管理成为业务创新的重点领域,通过精细化管理、高质量服务和业务组合创新,实现银信、银基、银证、银保等各类业务合作,为客户提供需求满足+应用场景(平台)+解决方案(金融、技术)的综合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可以持续改善客户体验,提升客户黏合度和忠诚度。

五是管理效率创新。在当前利率市场化冲击的形势下,通过条线化改革缩短组织层级,深入渗透产业链,将客户结构重心下沉;通过管理创新,重塑业务流程,缩短前中后台的距离,加宽层级管理幅度,降低运营成本,以提升市场的响应速度;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确保资产和负债之间在总量、价格和期限上合理匹配,可以有效提升单位资产效益。

六是技术支持与数据应用创新。一切决策、管理都是基于对信息数据的判断,包括对客户提供服务、客户支持和自身运营管理系统等,是实现工作流程的精细化、标准化的技术保障。目前,传统银行业正面临数字化和数据变革,据估算,未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金融完成的零售银行销售与咨询份额将从2012年的15%增至2020年的40%以上。为此,银行业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推动业务向数字化转型,推行以数据为中心的“银行融合电商”综合化经营模式,通过客户数据行为分析,精准定位销售,改善客户体验,不断完善直销银行、移动金融等业务虚拟渠道服务功能。

创新成新常态下银行业发展主题

□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 曹飞燕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速度、结构、动力发生变化的集中反映,是经济增速步入中高水平,追求更加平衡、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相伴金融领域变革使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银行业资产风险受去产能化、去杠杆化的冲击影响持久而深远,行业整体发展速度将持续放缓。

银行业步入新常态

在经济新常态下,供给和需求两端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相应转变。从需求看,原有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同步放缓,未来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消费的增长和技术创新的红利;从供给看,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逐步减弱,劳动力、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综合成本上升,导致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强,而新的改革红利还没形成和释放;从经济风险看,前期的政策溢出效应依然在发挥作用,但资产价格泡沫严重,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压力大,政府负债率超高,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都使银行业面临传统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加的市场与操作风险及关键时点的流动性风险挑战,这些因素会制约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对结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并进一步加剧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从宏观政策看,2015年将继续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更均衡地拉动增长。

应该看到,跨界融合与商业模式创新正带动新一轮产业升级,新业态、新增长点正在涌现,如“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实施将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互联互通;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质性推进将推动兼并重组等;新能源汽车、3D打印、材料应用、智能机器人、APP的广泛应用等不断成长的新业态;伴随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传统的生存型消费逐步向医疗、教育、旅游休闲等改善型消费升级等。

只有深刻认识、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深入分析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市场机遇和风险挑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银行业单纯靠拼规模、上存款、要利润的高增长模式,加快改进战略定位、业务模式和管理机制,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进入创新驱动、变革服务、拓宽渠道的内涵式增长阶段。银行业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银行业盈利增速趋缓的新常态。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银行业资产和利润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也难以维系。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末,银行业总资产168.2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各项存款余额117.4万亿元,增长9.6%;各项贷款余额86.8万亿元,

增长13.3%;不良率1.29%,拨备覆盖率230.5%。同时,2014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12.7%,较前5年平均下降了近一半。预计2015年央行将延续上年度的不对称降息,通过利率手段让利润反哺实体经济,受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放缓、利率市场化程度加快、资产质量压力加大、减值损失准备增加、监管更趋规范、同业跨业竞争加剧和互联网金融冲击等多重因素影响,2015年银行业净利润增速将显著放缓至个位数水平。

二是监管趋严的新常态。2015年持续变化的监管框架与风险文化,将使监管政策更加注重公司治理、资本约束和新会计准则的应用,未来审慎持续监管措施更为有效,市场化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合规性监管要求日趋严格,对银行的资本金、流动性和融资要求标准不断加码,这些将持续挑战着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业务创新、资产定价等综合管理能力。

三是宏观调控的新常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将成为2015年货币政策调控的主基调,稳健货币政策中性偏松,调整的节奏和频率可能更加积极。预计受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拖累,2015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偏松的空间打开,降息降准和定向宽松的组合运用更为普遍。

四是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创新驱动将替代传统增长模式下对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程度依赖,成为稳增长的动力。在创新驱动下,金融业态生态更趋多元,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成为新常态。2014年7月25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获准筹建;同年9月29日,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获准筹建。2015年,已经获批的民营银行预计将陆续开业,成为服务实体经济和当地区域经济的新生力量,但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准入退出机制将逐步形成,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强。

银行业持续发展的六个着力点

一是治理结构创新。公司治理是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利益驱动机制、权利约束机制、责任保障机制三位一体的统一。随着国家现代治理的完善和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为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创新的关键。通过混合所有制健全组织架构,清晰职责边界,实现商业银行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协调发展。

二是商业模式创新。借鉴并融合互联网金融互联互通、跨界整合的发展思维,建立“商务+金融+社交”的生态圈平台,通过财务、汽车、住房、医疗保健,以海量客户、高频接触为目标,以互联网的生活化场景应用实现非传统金融领域的业务突破,以传统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化实现业务条线的相互渗透,打造完善的互联网交互平台体系,最终形成立足于